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2期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o. 2 2013
(第12卷) (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 12)

美国中国学的发端史研究

孟庆波[1,2]

(1.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 300071;2. 河北联合大学 外国语学院,河北 唐山 063009)

摘 要: 美国中国学的最终创立者远东学会产生于美国东方学会并在初期与之联合,而东方学会是美国传统汉学研究的大本营。中国学研究在美国汉学内部发端是由美国汉学的特性所先天决定的,也是当时美国现实需求和学术发展的必然结果。汉学与中国学的初期合作并未能掩饰双方在学术主张上的根本差异。研究美国中国学的发端史能揭示汉学与中国学最初的关联与纠葛,从双方的决裂过程彰显二者的差异。通过研究美国东方学会、远东学会、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等美国重要涉华研究机构和组织在中国学发端期的互动,可以反映美国中国研究的一段发展史。

关键词: 中国学; 汉学; 发端史; 美国东方学会; 远东学会

中图分类号: G4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202(2013)02-0151-06

汉学,指的是外国对中国历史文化所进行的人文科学研究,是审视我们自身文明的另一面镜子。中国学产生于20世纪中期,是以社会科学各学科为手段对中国进行的全方位研究。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背景下,对汉学、中国学的研究进行反研究、了解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中国学首先在美国诞生,其发端过程始于美国太平洋学会(American Council of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终于远东学会(Far Eastern Association)[1]。正是远东协会的学术模式为中国学研究树立了标杆,成为初期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参考标准。美国中国学自诞生后就一直引领西方世界的中国学研究,其对中国历史、社会、政治、经济、边疆的解释甚至影响到国内学界。著名的"新清史"和"大分流"研究就是案例。美国中国学由美国汉学孕育而生,并在早期与之合作,二者之间有着复杂而矛盾的关联。回顾美国中国学发端时的情形,将加深我们对早期美国汉学、中国学的理解。

一、美国汉学的特性与中国学发端的必然

从学术史上追溯,美国汉学有两个主要源头,一是"中国源头",即来华传教士的汉学研究,以一份侨居地汉学期刊Chinese Repository(《中国丛报》)为代表。美国汉学的另一个源头就是美国本土自发的汉学研究。这一源头来自美国东方学会(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费正清曾说,美国有组织的汉学研究始自东方学会[2]。美国东方学会于1842年成立,是美国历史上第二个专业学术团体。该学会的宗旨是以文献学和考古学的方法考察东方学,"传播关于东方的知识,促进对东方语言和文学的研究"[3],汉学是其中的一个关注点。早期的美国汉学家索尔兹伯里(Edward E. Salisbury)、卫三畏(S. W. Williams)、劳费尔(Berthold Laufer)、恒慕义(Arthur W. Hummel)都曾担任其会长。该学会每年举办年会讨论东方学包括汉学的重大研究热点,出版有《美国东方学会会刊》、《美国东方学会丛刊》、《美国东方学译丛》,并设有一个收藏有关东方学文献的专业图书

收稿日期: 2013-01-22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0CZS0024)

作者简介: 孟庆波(1977—),男,河北卢龙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河北联合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欧美汉学史.

馆。

《美国东方学会会刊》是美国早期汉学的重要载体。在华传教士如卫三畏、咩士(William A. Macy)、丁韪良(W. A. P. Martin)、玛高温(D. J. Mac-gowan)等、学院派汉学家如夏德(Friedrich Hirth)、劳费尔(Betthold Laufer)等、华裔汉学家陈荣捷(Wing-Tsit Chan)、邓嗣禹(S. Y. Teng)、张琨(Kun Chang)等都在会刊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内容涵盖中国语言、文学、思想、宗教、少数民族、科技、艺术等汉学研究的所有领域。考察美国汉学,《美国东方学会会刊》是一条必由之路。

美国汉学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有强烈的现实观照,其"纯正度"似乎不比欧洲汉学。这一点在美国汉学的最初期即已显露端倪。据笔者统计,从1843年创刊到1863年,《美国东方学会会刊》的前7卷上共刊登有关中国的文章18篇。在这些文章中,我们发现有几篇文章带有强烈的现实关照色彩:

1. China: Its Population, Trade and the Prospect of a Treaty,"中国其人口、贸易及签订条约的前景",作者格里诺(William W. Greenough,美国东方学会创办人之一),1843 - 1849年第1卷;

2. On the Late Dealing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ern Powers,"最近中国和西方列强的交涉",作者卫三畏(1881 - 1883年美国东方学会会长),1860 - 1863年第7卷。

明末清初的耶稣会士曾对唐代"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做出过种种解读,力图以"索隐"思想找到天主教在唐代即已传入中国的证据。美国新教传教士出于传教的功利性目的,对该碑也进行了大量研究。作为传教士汉学在美国本土的堡垒,《美国东方学会会刊》也刊登了数篇文章,为传教士们摇旗呐喊,吸引更多美国人的注意以支持这些传教士的事业。本文试摘列如下:

1. On the Genuineness of the So-called Nestorian Monument of Singan-Fu,"论西安府景教碑的真实性",作者索尔兹伯里(E. E. Salisbury,1863 - 1865, 1873 - 1880年美国东方学会会长),1853年第3卷;

2. The So-called Nestorian Monument of Singan-Fu,"西安府景教碑",作者 Josiah W. Gibbs,1854年第4卷;

3. On the Nestorian Tablet of Singan-Fu,"西安府景教碑",作者伟烈亚力(A. Wylie,英国传教士、汉学大家),1855 - 1856年第5卷;

通过以上简单分析,不难发现美国的汉学不同于欧洲那种传统意义上的书斋式汉学,它夹杂了很多现实关照、传教关怀和国家利益的成分。因此,费正清曾说,"美国东方学会从一开始就有一种与众不同的使命感","美国的东方研究是与福音传道相联系的。"侯且岸教授也明确指出,这种使命感体现为他们要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为美国对东方的扩张政策服务[2]。因此,美国的汉学研究从最初的发源时起,就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偏离西方传统汉学的发展轨道,形成了具有美国自身特色的汉学[4],而这种自身特色,也为美国中国学的发端埋下了伏笔。

二、美国东方学会、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远东学会与美国中国学的发端

国家利益总是从最潜层影响着学术的走向。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走上了对外扩张、争夺世界权益的道路。1899年美国对中国提出"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等政策,加入列强在华势力范围的争夺。利益的需要使美国急需有关中国现实的方方面面的知识。尽管有现实关照、有服务于国家利益的一面,但美国东方学会所进行的那种以人文研究为主的工作则远远不能满足美国的需要。此外,20世纪2、30年代,社会科学在美国异军突起,又加上美国的实用主义传统使它很容易找到用武之地,社会科学的发展态势很快压过了传统意义上的人文学科。另外,在研究方法上,区域研究概念的提出对汉学形成了最严重的挑战。所谓区域研究,就是集中人文及社会科学多种学科,对某一国家或地区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因此,研究手段集中于历史学,较为单一的汉学受到了

以区域研究为手段的社会科学的强大压制[5]。面对学术生存的严峻形势,许多汉学家都在思考汉学的未来走向,为其发展寻求出路。

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于 1919 年成立,这是一个有关人文科学研究团体的联合机构。该学会一直是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倡导者和领导者。1954 年美国东方学会的一份决议让我们透视了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的作用:"自从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成立以来,美国东方学会一直钦慕理事会在人文科学研究领域内对学会的领导和启发;理事会的会员制度让学会有机会与其他学术组织进行接触并与国际学术联合会建立联系,学会对此深表感谢;如果没有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提供的睿智建议、对人文科学的经常性评估、对出版的鼓励、在会员的吸纳和人员培训上的广泛支持,本学会在过去 35 年里的工作将会是极为有限的;在东方学、宗教和语言学研究领域,理事会的各专业委员会都为本学会提供了大量宝贵的支持;本学会的众多东方研究项目都苦于资金不足,而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都出资予以扶持。"[6]

为满足美国对现实中国知识的渴求,该理事会在格雷夫斯(Mortimer Graves)的大力提倡下两次召集中国学研究促进会议(Conference on the Promotion of Chinese Studies)。1928 年 12 月 1 日,首届会议在纽约举行,美国东方学会会长恒慕义应邀出席并主持了会议。1929 年 4 月,第二届会议又紧接着召开,并且在 1931 年 5 月出版了论文集《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进步》[7]。

美国东方学会作为美国汉学的创生者,也以其学术敏感性洞察汉学研究的新形势,并且最初以积极姿态面对中国研究的新发展。早在 1928 年 4 月 10—12 日的美国东方学会第 150 届年会上,我们发现了美国东方学会有关汉学研究的第一次正式声明:"本会渴盼科学的汉学研究能够在美国得到有力扶持,因此,本会决定在《会刊》鼓励刊发汉学文献并在年会上探讨汉学事宜。"[8] 1928 年时任东方学会会长的恒慕义不仅主持了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的首届促进中国学研究会议,并且该会议的第二届就直接在美国东方学会 1929 年 4 月 2—4 日的年会上召开。在本次促进中国学研究会议的推动下,美国东方学会的年会也首次采用分组讨论的模式,共分为印度学组、闪米特组和远东组。正是这次中国学研究促进会议使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成立了远东研究委员会(Conference on Far Eastern Studies),美国东方学会也决定与之大力合作。美国东方学会的年会会纪表明,1930 年至 1933 年,该学会连续 4 届年会与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远东研究委员会联合举办。

然而,在传统汉学的大框架下,美国东方学会对新萌芽的中国学研究的支持步伐还是没能跟上节拍。1936 年,曾经留学英中两国的费正清(J. K. Faribank)以博士论文《中国海关的起源》获得牛津大学的博士学位后,返回美国。他在中西关系史研究中首创对中文资料的发掘和利用,并提出解释中国近代史的"冲击—回应"框架。以费正清为首的美国中国史研究新生代逐渐对美国传统汉学研究提出挑战[9],这种学术裂痕也在美国东方学会内部出现。1941 年 6 月 9 日,为倡导学术新趋向、出版《远东季刊》(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远东学会经纽约法律部门批准成立,创建者 7 人,均为美国东方学会会员:宓亨利(Harley F. MacNair)、塞勒斯·皮克(Cyrus H. Peake)、波顿(Hugh Borton)、魏特夫(Karl A. Wittfogel)、毕乃德(Knight Biggerstaff)、宾板桥(Woodbridge Bingham)和普里查得(Earl E. Pritchard)。费正清等 12 人组成编辑顾问委员会,指导《远东季刊》的选材和刊行。这 12 人的顾问委员会中也有 8 人为美国东方学会会员:卡梅伦(Meribeth E. Cameron)、葛德石(George B. Cressey)、Charles B. Fahs、费正清、Robert B. Hall、Frederic D. Schultheis、施维许(Earl Swisher)和弗吉尼亚·汤普森(Virginia Thompson)。

1941 年 11 月《远东季刊》的第 1 卷第 1 期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创刊号阐明了远东学会及《远东季刊》的学术主张,试编译如下:"《远东季刊》的首卷目录即已表明,本刊的目的是要填补有关当下事件、意见的刊物与更加专业化、学术化出版物之间的空白。我们的办刊宗旨有如下两点:一、推动学术研究,为远东研究的专家们提供出版平台;二、考虑读者群体,兼顾普通

读者和各专业领域对东亚研究感兴趣的师生。"[10]在创刊号上,《远东季刊》共刊发4篇文章和11篇书评,其中有2篇文章及7篇书评属于中国研究。我们看到,除费正清的书评以外,其他文章尚未与传统汉学的研究模式彻底断裂。

如果说创刊号还在四平八稳地进行"汉学式"研究的话,1942年2月出版的第1卷第2期则在扉页上刊出编辑寄语"The War in the Pacific and Editorial Policy",充分表现了该刊对现实的关注,对以后该刊的选材取向也有标杆意义。试编译如下:"编辑部敏锐地察觉到太平洋冲突带给《季刊》的新责任和机遇。这会增加本刊的读者面;此外,为求得持久和平,人们也需要对局势进行客观、睿智和附带同情的评判。因此本刊的政策就是支持刊登有关太平洋地区战争与和平的文献。尽管在国家危难之时本刊的政策将偏重太平洋战争,但本刊的原定目标也不会被舍弃,即继续刊登西方和远东现代接触中有关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文章。从现实角度来讲,对如此宏大历史背景的掌握是明晰太平洋战争的必备前提。这场战争还将不可避免地使西方人更加意识到远东在战后世界战略、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11]

作为第2期的呼应,1942年8月出版的《远东季刊》第1卷第4期"Notes and News"栏目则显示出刊物对现实学术的关注,它详细报道了由战争所引发的学界动态:1、对远东语言的强化培训。2、为帮助各级学校在教学中加入有关远东地区的教学,美国教育委员会筹建了"美国教育界亚洲研究委员会。3、国会图书馆的中国寄存书和微缩拍摄问题[12]。

在中国学研究热度渐高、融入更多现实关注时,作为美国传统汉学的旗手,美国东方学会内部对于非传统汉学的研究方法却显示出极大的忧虑,并决定采取措施对其进行限制。1946年美国东方学会第156届年会有明显记录。此前美国东方学会的部分会员已经向学会总部提出了《会刊》的学术领域、办刊方向和效用的问题,呼吁对学会进行变革、对东亚进行更多的社会科学性质的研究。这引起东方学会高层的谨慎思考。本文试编译学会高层的答复如下:"《会刊》被指过于偏重近东研究、古代和中世纪研究和语言学研究,这就涉及到我们是否会将学术重心逐渐转向亚洲边缘、现代研究、普通文化以及一般性的阐释研究。学会承认这种趋势可能会有暂时性、区域性及功能性的存在。但我们更认识到学会及《会刊》仍将保持其人文研究的本质,不会涉及社会科学所关注的议题。" 其后,哈佛大学费耐生(R. N. Frye)提出解决方案:学会及《会刊》不应关注东方世界的现代政治和经济问题,也不应当涉及印欧语系的纯语言学问题以及缺乏成型文献和研究传承的现代东方语言研究。这就充分显示了美国东方学会坚持其传统汉学研究路数的决心。当然,为避免会员的流失和学会的分裂,美国东方学会不想与萌生期的中国学决裂,又有如下声明作缓和:"我们认为学会可能会有一些变化,这些变化会在未来《会刊》的文章刊发上有所体现。我们将向本学会的执行委员会提出如下建议:1)要求下届年会在通常议程之外,安排有关"今日东方"等一般性主题的议程,方便会员提交有关当下东方世界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议题的文章;2)要求编辑从上述提交的论文中挑选适当文章,作为《会刊》的副刊印行。"[13]

1948年,第158届美国东方学会年会在纽约召开。学会的执行委员会作出如下声明:"我们已经注意到一些关注远东研究的学者正在筹建一个新的全国性学术组织。为此,我们已经指定由白瑞华(Ruswell Britton)、文礼(Archibald Wenley)和德克·卜德(Derk Bodde)组成一个专门委员会向他们表达我们的祝贺之情,并探讨双方研究工作的协调事宜。"[14]

然而,美国东方学会的这些安抚工作未能遂愿。《远东季刊》的迅速壮大已经使远东学会的正式独立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1948年8月出版的《远东季刊》第7卷第4期刊登了远东学会正式注册并成立的公告,对远东学会成立的始末、学会的机构建制、章程附则、编辑出版等进行了细致规定,并正式宣告学会的宗旨:1)激发学界兴趣,推动对远东的学术研究;2)通过《远东季刊》、《远东文献书目》(年刊)、专著及其他方式,为远东及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出版平台;3)推动远东研究

领域的学术交流和信息流通;4)每年召集年会,组织论文讨论[15]。以此,远东学会和《远东季刊》就脱离了母体——美国东方学会,走上了自己独立发展的道路。

独立后的远东学会并未离开东方学会太远,但时间见证了二者渐行渐远的历程。

1949 年第 159 届美国东方学会年会和远东学会的首届年会于 4 月 5—7 日在耶鲁大学联合召开。远东学会会长恒慕义主持了双方的联席议程。双方参会会员及宾客共 193 人在耶鲁大学餐厅联合举行宴会,远东学会副会长 R. B. Hall 主持。远东学会会长恒慕义发表主席演讲"Some Unfinished Tasks in Chinese Studies"(中国学研究的未竟任务)。应该说,双方的初期合作是有效的,1950 年的美国东方学会年会会纪上发现该学会向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作出声明的记录:"本学会愿意强化与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及远东学会的协调与合作,以期共同推动美国的远东研究。"[16]此后,1951 年和 1952 年美国东方学会年会与远东学会年会连续两年联合举办。1954 年双方再度联合召开年会。然而,毕竟双方的学术追求是不同的,这种学术目的的差异对学术组织之间的合作造成了致命的伤害。

美国东方学会极力维护其汉学研究的传统,将自己的学术目标紧紧定位于对古代东方文明进行以历史学为主要手段的文献学和语言学研究,并且越来越呈现出对近现代文明敬而远之的趋向;而远东学会自成立之初就显示出强烈的现实关注和对国家、对时代的责任感,追求以社会科学为手段的对现实中国的全方位研究。这种汉学与中国学在学术主张上的决然差异使双方的裂痕一步步走向不可弥合的程度。1958 年美国东方学会第 168 届年会与亚洲研究协会(远东学会更名而来)年会共同举办,这已是双方的最后一次联合年会。

三、关于美国中国学的确立问题

美国太平洋学会于 1925 年在夏威夷建立。它提倡现实性的区域研究,率先打破了美国东方学会的传统汉学研究独揽天下的局面。太平洋学会成立后积极推动远东问题专家的培训工作,资助出版了大量有关远东研究的著作。据统计,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在美国出版的有关亚洲研究的书籍,有一半得到过太平洋学会的资助[17]。正是由于太平洋学会的卓越工作,它成为二战期间美国对太平洋地区及整个亚洲形势的"最重要的唯一来源"[18]。唯有不足的是,《太平洋事务》相当年头内所刊发的文章显示出学术性和系统性不足的弱点,有些甚至接近于新闻报道。这使得该刊难以称得上是严肃的学术刊物。哈佛大学燕京学社首任社长叶理绥(Serge Elisséeff)曾指出,1799 年以后的中国研究已超出学术的关注的范畴,顶多属于"单纯的新闻工作"[19]。这话应该有所指向。不过,太平洋学会对美国中国学的启迪之功不可抹杀。

而《远东季刊》自创刊之时就注重选文的学术性和专业性,其学术地位自是《太平洋事务》不可比拟。作为美国中国学的最终创立者,远东学会不仅刊发了大量工整的学术论文,它对美国中国学学理的深入探讨也彰显了其中国学宗师的地位。1964 年《亚洲研究杂志》(由《远东季刊》更名而来)第 23 卷第 4 期和 24 卷第 1 期刊登了美国亚洲研究学会第 16 届年会"中国研究与社会科学学科"专题会上提交的一组论文。这组论文的发表在美国中国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体现了传统汉学家以及中国学家面对"汉学与中国学"时的不同思考[20]。

此外,《远东季刊》(《亚洲研究杂志》)对于美国中国学的特殊贡献还体现在其广阔的学术视角和为其后中国学腾飞所做的基础工作。其专栏"亚洲研究书目",刊登以英文出版的有关亚洲研究的文章和著作,有相当大的比重是有关中国学研究的。这份文献清单是研究美国中国学的最重要窗口。1970 年,美国亚洲研究学会(Association of Asian Studies,由远东学会更名而来)将该栏目所刊文献单独出版,有 Cumulative Bibliography of Asian Studies, 1941 – 1965 共八卷,1973 年又出版续著 Supplement, 1966 – 1976 共六卷。

参考文献:

[1] 李 晔. 拉铁摩尔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美国中国研究[J]. 党史研究与教学,2007,(1):70-76.
[2] 侯且岸. 当代美国的显学[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0-31.
[3] Constitution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843, (1): vi.
[4] 仇华飞. 论美国早期汉学研究[J]. 史学月刊,2000,(1):93-103.
[5] 刘招成. 美国中国学研究[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5-6.
[6]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at New York, N Y[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954, (3): 204.
[7] 朱政惠. 美国中国学史研究[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63.
[8]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at the Meeting in Washington D C[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928: 347.
[9] 万 明. 第49届美国亚洲研究协会暨美国明史学会年会综述[J]. 中国史研究动态,1997,(7):19-24.
[10] To our Readers [J].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1941, (1): 3.
[11] The War in the Pacific and Editorial Ploicy[J].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1942,(2):5.
[12] Notes and News [J].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1942, (4): 419-420.
[13]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at New York City[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1946, (4):334-337.
[14]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at New York City[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1948, (4):215.
[15] The Far Eastern Association, Inc[J].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1948, (4): 410-418.
[16]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at Cincinnati, Ohio[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950,(3): 217.
[17] 赵晨诗. 论美国汉学到中国学的变迁[D]. 北京:北京语言大学,2007:10.
[18] 仇华飞. 二十世纪上半叶美国汉学研究管窥[J]. 档案与史学,2000,(4):66-71.
[19] 陶文钊. 费正清与美国的中国学[J]. 历史研究,1999,(1):148-162.
[20] 列文森. 关于美国中国学的一场学理探讨[M]//美国学者论美国中国学.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86-124.

Study of the Origination of the American Chinese Studies

MENG Qing-bo[1,2]

(1. *College of History*,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2.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Hebei United Univeristy*, *Tangshan* 063009, *China*)

Abstract: The Far Eastern Association, founder of the American Chinese Studies, was organized with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engine of the American sinological studies. The origination of the Chinese Studies was an inevitable outcome of the special trait of the American sinology, and the result of the call of times and scholastic progress in the U. S. as well. The paper involves multiple scholastic institutions realted to the topic, in whose interactions we can have a galnce at the American scholastic development in the first half the 20th century.

Key Words: Chinese stuides; sinology; origination;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far eastern association